

·探索与争鸣·

# 守正与创新：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模式 演进特征、逻辑转向与实践启示

张瑞林<sup>1</sup>，车雯<sup>2</sup>

(1.北京师范大学 体育与运动学院，北京 100875；2.济南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摘要：**知识生产所蕴含的内在规律是深入探讨学科诞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目前，我国体育学科建设未能有效适配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内在要求，表现为弱化体育学“身心群”整体性学科特色，夸大西方科学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脱离“中国式现代化”体育叙事的时代特征等。为了有效回应知识生产模式演进对体育学科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纾解体育学科建设的深层困局，通过梳理与归纳知识生产模式演进的历程举要，凝练与探骊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发散式孤岛型”“聚敛式融合型”“集群式拓展型”的演进特征。对标知识生产的价值导向、共生共存和辩证统一，识别与明晰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转向。遵循知识价值观是体育学科建设的价值旨归，探寻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动力机制、组织机制和治理机制一体化体育学科建设实践进路。

**关键词：**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模式；演进特征；逻辑转向；实践方式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23)02-0001-08

##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Evolutionary features, logical turning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for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ZHANG Ruilin<sup>1</sup>, CHE Wen<sup>2</sup>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China)

**Abstract:** The intrinsic law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essential requirement for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in China has failed to effectively adapt to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weakening of the holistic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d-body cluster" of physical education, the exaggeration of the "cross-contextual validity" of western scientif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the detachment from the contempora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 sports narratives."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evolution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the present study have to make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so as to effectively respond to the new requirements put forward by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and to relieve the deep-rooted dilemm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and also will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history of the evolu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s, condense and explore the "dispersive island type", "convergent fusion type" and "cluster expansion typ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clustered and expanded" are summarized. This work also identify and clarify the logical direc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y align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coexistence and dialectical unit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Following the value of knowledge

收稿日期：2023-03-1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2022NTSS25)。

作者简介：张瑞林(1963-)，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与体育管理。E-mail: zhangruilin@sdu.edu.cn

values as the valu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this study als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under the change of th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in terms of the dynamic mechanism,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

**Keywords:** phys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 knowledge production model; evolutionary features; logical turning; practical approach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体育工作的重要意义,集中回答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创新性地形成了体育发展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论断。这既为新时期中国特色体育学科发展的时代转向和历史方位提供了总指引与总遵循<sup>[1]</sup>,又为现阶段我国体育学科突破发展难题,实现以主动适应与回应经济社会需求、构建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现实指向与战略选择。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实践情境导向、学科交叉性、主体异质性、生产场域社会化等特征日益凸显<sup>[2]</sup>,对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带来全新挑战和难得机遇,成为驱动体育学科知识转型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育学科的必经之路<sup>[3]</sup>。

学科是知识生产、传播与运用积累到一定阶段的产物<sup>[4]</sup>。知识生产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关键,也是学科发展的基本形态与内在动力<sup>[5]</sup>。随着知识生产的不断演化,体育学科建设面临着从观念到组织、从制度到文化的知识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双向重塑,亟需通过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倒逼体育学科建设改革。为此,随着体育与社会发展多态一体新格局的逐步生成,面向新时期体育实践探索的新问题,如何“守正”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质特色,发挥体育学服务于“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独特功能,为体育学理论发展和创新提供知识生产的内生支持;又如何“创新”体育学与不同学科间的表达机制,为增强体育学科话语权提供新的坐标方位,建立起知识生产到体育人才培养的反馈机制?

本研究从体育知识生产模式演化的内在规律出发,系统回答以下三重问题:一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困局是什么?二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经历了哪些阶段,具有什么特征?三是体育学知识生产逻辑所隐喻的体育学科建设路向是什么?通过上述问题的回应,以明晰体育学科建设的逻辑起点、发展着力点与价值落脚点,为新时期体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 1 新时期体育学科知识供给的深层困局

我国体育学科知识供给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工业化经济转型、城市化社会转型与科层化组织转型等因素影响,再加上全球化新境遇,日本、美国、德国等国

家学科理论、方法与范式渗透,这为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提供强大动力的同时,也使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历史局限进一步显现。尤其是面向高级知识经济时代新要求,原有知识供给与之产生了种种不适应与不协调,表现为体育学科理论难于有效支撑体育实践发展的新问题,传统体育学知识供给与人才培养之间“供需”张力难以弥合,体育学陷入整体性知识供给不足、本土化知识生成欠缺与现代化知识创新乏力的困境<sup>[6]</sup>。

### 1.1 问题基因:拆解了体育学“身心群”整体性学科特色

体育学科知识并非是形而上的概念化、理论化或数字化命题表征就可以完全表达和解读的纯基础研究,而是由运动者本体感受、运动时所处情境以及与他人交互时,呈现的缄默知识、过程性知识共同构成的信念,这也成为区别于其他知识的核心本质,具有体育学独特知识型学科的鲜明特征<sup>[7]</sup>。然而,长期受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系统理论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认知心理学产生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研究范式,倡导将认知活动机械简化为人脑中抽象的信息处理过程,摒弃了认知者身体、经验和所处环境对认知过程的影响<sup>[8]</sup>。而这种二元认知反映在体育学科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知识本位”学科困境,这种认识论割裂了体育活动中物质形态的“身”、意识形态的“心”与社会形态的“群”的同一性。这也不可避免的导致体育整体性知识的碎片化和关联认知的离散化,造成离身知识与具身知识、显明知识与缄默知识、抽象性知识与情境性知识的相互支解。致使体育学科内壁垒分明,相互分割,知识涵盖面封闭狭窄,常被误读为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学科特质不清晰,学科话语羸弱等突出问题。而事实上,体育学知识是“技能、体能、意志、情感”的统一,也是汇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各领域的综合性认知,蕴含认知主体的、默会的、具体情景化的知识观,标志着多种体育形态的相互协同,是体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鲜明底色,最能展现体育学特色性、差异化的知识类型。

### 1.2 理论依赖:夸大了西方科学理论知识的“跨情境效度”

体育学是在西方工业文明语境中伴随现代化进程而发展起来的<sup>[9]</sup>。“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是追问西方体育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效度如何?即本土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特色与普通等范畴中,体育学知识如何有

效融合这些关系?从知识形态与知识性质的坐标系上,回顾与反思中国体育学发展的历史征程,可以发现,最初体育学是被作为蕴藏于教育学、生理学等母学科知识结构“零散化”的研究对象,并受赫尔巴特引领的经验主义等理论洗礼,片面追求科学化,导致教条主义出现。直到学科逐渐细化、分化后,受德国教育体系影响,体育学逐渐演化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因其学科建设往往以苏联模式、西方理论为基础,惯用西方话语解读中国实践,严重主导了中国学者的思维范式,导致一直没有形成体育学独有的知识形态和符合中国体育实践的知识范式,很大程度上造成对中国体育问题的认识扭曲,对西方科学知识的跨情境效度产生质疑。具体而言,西方科学理论进入中国社会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中国从最初效仿苏联模式形成体育理论雏形。到改革开放以来,转向全盘吸收西方科学主义理论,长期照搬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体育思想、原理、理论与知识等,片面移植母学科知识体系,过渡依赖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在这种知识观的映照下,“简单嫁接”“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或以切割、剪裁中国体育经验来与西方“对话”等现象非常明显<sup>[10]</sup>,导致中国本土特色的、基于中国体育特色实践的体育学知识,既难于解读本土体育现象,又难于解决本土问题,忽视了中国情境特殊性和体育科学知识多元化的事实,夸大了西方科学知识对中国体育问题的普遍性解释。

### 1.3 实践反思:脱离了国家战略与社会服务需求的时代诉求

知识供给无论是所产生的语境还是所针对的问题,都具有时代价值性。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符合那个时代的精华<sup>[11]</sup>。中国式现代化的体育实践是在“赶超型”向“可持续型”再向“高质量发展型”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中发展起来的,并呈现出转型时期下的鲜明特征<sup>[9]</sup>,亟需与之相适应的体育学知识做出时代性、普遍性、情境性与系统性回应。体育学如何回答这种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的实践价值,决定了其是否能够改革和深刻影响现实问题。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下体育学科知识逻辑暴露出的矛盾愈加突显。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叙事的话语体系构建使命,体育学已有知识体系呈现出严重的局限性和落后性,既不能借助自身知识体系作出科学性阐释,更不能提供行之有效的破解思路与行动方案。新生知识增长点同样迟缓,体育学知识创新生命力不足,新兴交叉学科“貌合神离”,尚存体育学科专门化知识的简单叠加风险,难以为中国体育实践叙事和演绎作出有说服力的学理

支持和人才供给。尤其体现为我国体育在融入社会网络中,体育内部仍存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分而治之的旧形态。面向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体医融合等国家战略,以及社会老龄化、慢性流行病、青少年体质健康等社会问题,以往单一的同质性学科组织格局与体育人才培养模式,不能有效适配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亟需搭建知识生产与人才培养之间的联通机制。因此,体育学科亟需立足知识逻辑、国家逻辑与社会逻辑,遵循科学规律,以融入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实践问题为导向,以继承和创新、交叉与融合为途径,构筑与中国体育改革实践相适应的叙事方略。

## 2 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演进特征

学科是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生产和演化是学科动态调整的本体价值,也是学科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逻辑和合法性基础<sup>[12]</sup>。从19世纪初德国柏林大学诞生至今,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先后经历了3次重大变革<sup>[3]</sup>。每次变革均对知识生产组织结构、行动场域与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

### 2.1 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发散式孤岛型”特征

知识生产模式是对知识生产不同方式的系统性归纳与深刻提炼<sup>[13]</sup>,知识生产又是学科建设的必然使命。在资源禀赋、需求空间与人们对科学知识生产规律的理性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共同影响下<sup>[14]</sup>,催生了知识生产模式三重变革。19世纪初,德国柏林洪堡大学的诞生,标志着知识生产模式的首次变革。知识生产不再单纯的是学者个人“闲情逸致”的兴趣行为,而是为了真理而服务的内生性知识追求和学科组织制度化的产物,迈吉尔·吉本斯将这种模式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在知识生产模式I中,体育知识的出现受单一知识逻辑驱动,整体上呈现出“发散式孤岛型”特征。

古希腊时期甚至更早的史前时期就已经出现“体育知识”,但泛指与身体活动有关的知识,更多属于“形而上学”的知识范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sup>[15]</sup>。直到科学革命之后,从15世纪开始,体育知识才零星的出现在教育学、医学等学科中。然而以运动技术或技能为表现形态的体育实践知识并未成熟,没有达到科学化、理论化与体系化的水平<sup>[16]</sup>。所以体育知识常以“零散式”的知识形态存在,具有较强的个人随意性认知,体育学的演化处于“问题研究形态”。从学科的建构路径来看,这一时期体育知识生产主要动力来自学者内在的精神需求,体育知识以原始发散性形态散落在其他学科,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以研究对象

为中心的知识结构。

随着西方思潮影响不断渗入,一直到18世纪末,体育教育训练学分支学科逐渐成熟,并分别在德国、美国建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逐步在学科制度层面得到认可,体育教育成了一个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1793年德国学者古茨穆茨的《青年体操》出版,标志着体育学逐渐以体育教育训练学为代表的分支学科,开始向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演化,并在母学科中以“真理研究形态”显现<sup>[17]</sup>。体育学开始以“体操学”的形态演化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19世纪体操在欧美各国传播开来,同时也伴随出现了多种新的运动项目,并在相应的学校体育开展中,也超出原先体操的教学活动范围<sup>[18]</sup>。直到19世纪末,体育教育学分别在德国、美国学科制度层面上得到认可,建立了相应的学术机构。伴随体育教育实践内容不断丰富,社会利益诉求不断变化,体育教育学成为知识“中心”,并逐渐与相关学科进行融合交叉,开拓新知识“边缘”,知识生产也逐渐体现出综合性、交叉性特征。这一时期随着知识内容的分化与重组,不仅促进了知识生产创新,而且也驱动了体育学科制度建设。单纯的依靠学者兴趣研究并不能支撑起学科形成的完整路径,必须借助学科制度规范进行知识组织管理。1885年末美国国家体育教育促进联盟(AAPE)的成立,标志着体育学开始走向学科制度化阶段,进入“学科范畴形态”。

该模式下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呈现出的特征为:一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是“自容性”活动,学者自身的求知欲是知识生产的内在动力,学者对知识效用极具渴望,具有“超功利”的理想主义色彩<sup>[19]</sup>。二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形式开始进入组织化单位,以学术规训为行动规则,结成一定规模的学术团体,开始趋向共同从事知识生产活动的行为。三是囿于机械主义本体论、理性主义认知局限,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活动“制度化”,知识生产仅限于单一学科内,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同质性与科层制。四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场域将大学与社会割裂开来,强调在学科内部去探求理论性真理,固守学科边界,局限了人类对复杂社会问题的全面认知和深入探索<sup>[21]</sup>。

## 2.2 体育学科知识生产“聚敛式融合型”特征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知识供给与创新的需求愈加强烈,知识在“基础”与“应用”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不断交互,知识生产边界开始变得模糊,学科分化局面不断形成与扩散,由此也对现代科学知识生产提出了新需求。20世纪中后期,封闭传统式知识生产模式I彻底被打破,催生了又一场学术革命,被迈吉尔·

吉本斯称为知识生产模式II。知识生产模式II对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求知欲引发“知识对话”,学科知识走向“视域融合”。知识生产模式I向模式II转型过程中,整体上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呈现“聚敛式融合型”特征。体育学科受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双重驱动,知识生产逐渐从“真理研究形态”向“社会研究领域”演化。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近代中国,体育学早期的分支学科受实用主义驱动,源于国家军事需要。虽然这种知识生产演进具有一定的结构化和科学性,但是知识生产并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

随着学制系统雏形的逐步完善,我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相关体育科学研究也随之展开,1924—1927年代表性学者罗一东等人的《体育学》问世,体育知识生产组织与机构也相继出现。1928年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美国全国运动训练者协会(NATA)等体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体育学术团体走向科学化、组织化与制度化。制度化的体育学科在此过程中很好地实现了知识生产与组织管理的有机结合<sup>[20]</sup>。1952—1960年一批体育科研机构相继成立,并围绕群众体育、运动训练和运动生理等多个学科领域展开体育理论和体育实践问题研究<sup>[21]</sup>。然而受国内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体育事业及体育学科建设进入了困顿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体育知识生产活动重回正轨,体育学科制度不断完善,学科结构逐渐优化。从1983年颁发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体育被列为教育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后经5次修订和调整,体育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学科地位从未改变。在此过程中,1996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统一规划管理的社会科学第19个一级学科,1997年作为一级学科的体育学,按照“学科中心”的逻辑,整合为4个体育学二级学科,形成了以身体活动相关,并蕴含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的问题域<sup>[21]</sup>。

该模式下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呈现出的特征为:一是知识生产目的“市场化”。知识生产动力不再单纯为了“真理而真理”,而是带有明显的“服务研究领域”。以适应我国市场社会需求和体育自身发展目标为导向,以解决国家和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基础问题和实践应用问题为依归。学者们围绕这一范式确定研究方向,并渗透于体育学学术活动各个方面。二是知识生产主体“多元化”。随着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向,“学科精英-高校”的秩序框架逐渐瓦解,为企业等市场主体参与知识生产提供了可能。多元主体基于不同的知识消费诉求,激发了知识生产与创新,

形成了高校、政府与市场有机联合的“三螺旋”知识生产组织结构。三是知识生产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多学科融合。以解决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为载体,加强不同学科间“问题域”的交流、借鉴和融合,逐渐打破单一学科解释力严重式微的困局。

### 2.3 体育学科知识生产“集群式拓展型”特征

21世纪以来,随着第4次科技革命推动,知识经济时代迅猛发展,为了解决国家、国际和人类共同面临的复杂问题,社会呼吁新时期知识生产目标应转向适配更多主体深度融合的知识经济发展要求,一种基于学科又不止于学科的超学科的生产模式运用而生,该模式被美国学者伊莱亚斯·卡拉扬尼斯称为知识生产模式Ⅲ<sup>[20]</sup>。虽然知识生产模式Ⅱ模糊了传统知识生产模式固化的研究边界,推动高校知识生产从“象牙塔”走向市场和社会,但也忽视了知识经济时代下,公民主体的价值互动因素,该模式仍与公民社会现实存在差距。知识生产模式Ⅱ向模式Ⅲ转型过程中,整体上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呈现出“集群式拓展型”特征。

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等影响,体育学科知识生产也趋向科学主义,追求体系完整、概念明晰、方法明确的知识体系和分科明确的体育理论。同时,随着市场和行政等外部力量介入高校知识生产的活动中,知识生产模式逐渐由纯学术逻辑转向知识生产组织的系统化和制度化,体育学科知识生产从“社会研究领域”进入了“学科范畴形态”。在知识逻辑与制度逻辑的双重驱动下,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持续演化创新,知识谱系逐渐完善<sup>[20]</sup>。例如,二战之后,体育学由单一的体育教育学发展成为以体育教育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训练学、体育社会学、运动心理学等中心学科。随着学科分化与重组加剧,原本体育学产生过交叉的学科再次分化出新的学科,又一次与体育学产生二次交叉,形成了体育经济学、体育人类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强国梦与民族复兴梦紧密结合,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为体育学学科建设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期,国家高度重视学科建设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作用,深入推进科教兴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等国家战略,推动体育学等各类学科走向了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体育知识生产价值不再拘囿于知识的真理性和人为构建性,而体现出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生命价值的整体关怀。这一目标具有新的统领性意义,将此前分散在体育学各单一维度上的目标整合起来,汇总为以满足人民生活需求的总目标<sup>[21]</sup>。体育学科已经开始转变为侧重体育学与生物学、医学、

城乡规划学、经济学、管理与科学工程等交叉渗透融合,导向前沿领域、深度领域的知识谱系,面向人民所需、产业所学,并在学科交叉的积累基础上,全力开拓体育学科发展空间。

该模式下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呈现出的特征为:回应媒介和文化导向的公众诉求,着眼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边界的协同创新,打破了“发散式孤岛型”模式中,知识生产的线性创新模式,也丰富了“聚敛式融合型”模式中,“政府—大学—企业”三螺旋的知识应用情境。表现出与以往知识生产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动力除了科学研究和应用实践外,“以人民为中心”的知识创新成为知识生产的动力源,并关注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关怀。二是知识生产主体从纯粹的学术机构延伸至科层制国家权利机构、产业界以及公民社会<sup>[24]</sup>,更加注重知识集群的内部连接和知识网络资源的整合。体育学所蕴含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价值等使其形成了跨越自然、人文与社会三大学科部类,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效应推动体育学新兴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三是体育知识生产活动的“非线性”场域,体育学逐渐转变为多个“中心学科”的综合性知识体系,使得体育学科知识生产走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更加突出了资源优化、主体协同、跨界融合。

综上所述,学科发展与完善的本质在于知识积累与创新,当学科原有的知识分类和组织方式,无法满足社会对知识的实际需求时,学科原有结构与体系发生转变,继而形成新的知识生产模式<sup>[22]</sup>。这一过程倒逼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动力演化,以更好地适应知识生产创新的本质要求,在新时期服务于人民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根本范式中,体现为体育学科组织趋向共生共存、学科制度不断开放灵活、学科知识逐渐交叉融合创新、学科文化日趋融合包容。

## 3 体育学科知识生产模式的逻辑转向

回顾知识生产模式三重演进的重大变革,纵观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发展历程,方兴未艾的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对体育学科建设具有深刻影响。基于此,运用系统性思维并从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逻辑指向”,以对标知识生产的国家逻辑、制度逻辑与文化逻辑这3个维度,阐释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逻辑转向。

### 3.1 逻辑起点:从追求卓越知识到服务我国体育理论和实践的价值导向

体育学科的价值重塑,要求重新审视体育学科特性。传统知识生产目的在于知识增长,经过三重范式

变革,改变了知识增长效用的传统发展逻辑,转向以为生命实践服务的公民逻辑和注重社会问题解决的现实逻辑。这就要求体育学科着眼于我国体育发展实践,尤其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中<sup>[25]</sup>,体育学科服务于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统领性目标。体育学科发展已跳脱碎片化、空心化,只关注知识本身,而忽视知识应用情境的拘囿,体育知识生产目标已转移至提升生产质量和人民生活质量上来。需要从国家层面,如“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体医融合”等战略中,探寻多种体育形态的相互协同。从市场层面,主动适应我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体育产业专门人才。从社会层面,维护社会公共体育利益,应对老龄社会的健康问题等。因此,体育学需要融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各领域,以学科融合回应时代需要,才能为中国体育问题的解决提供整体性的学理支持<sup>[9]</sup>。这无疑为重塑体育学科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价值观指明了方向。

### 3.2 逻辑介体:从学者个体行为到学科共同体协同创新活动的共生共存

传统知识生产模式中学者个体操控着知识生产活动,决定了知识生产的目标与方向。随着知识生产模式不断转型,多元知识生产主体交互协同,打破了知识生产垄断的“大一统”局面,衍生为体育学科知识生产的政治、文化、社会、公众等多重逻辑的创新活动。一是体育学科组织单元的多元化趋势明显。在传统的“发散式孤岛型”与“聚敛式融合型”知识生产范式下,体育学科组织构成单一,学者们以学术追求、学术规范与规训为联结,构成学术共同体,共同主宰着体育知识生产的内容、方向与进程<sup>[26]</sup>。伴随体育学知识的专门化与精细化,体育学科分化仍在继续。由于体育知识生产过程的历史性进程,我国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学校体育等长期处于相互分离状态,导致长期困扰体育学已久的碎片化问题难以彻底解决。而知识生产模式Ⅲ下的“集群式拓展型”新样态,驱动体育学科以回应媒介和文化导向的公众诉求,着眼多层次、多形态、多节点、多边界的知识协同创新。许多社会问题已无法由体育单一学科解决,跨学科研究成为必然趋势。学术团体已不再是唯一的知识生产者和消费者,体育学科组织已经成为了多元知识生产的复合体。这无论学科如何分化,学者研究问题如何多样,都是基于体育学整体在不同方向和领域的延伸与融合,进而促成学科知识的均衡协同发展。这一范式为我国体育实践建构多态一体的新格局,为搭建多学科领域平等的跨学科交往,构建话语协商机制的中介

平台,达成共识、共享与合作多学科观点,实现学科间的均衡协同提供了可能。

### 3.3 逻辑指向:从体育学碎片化整合到寻求学科交叉融合研究的辩证统一

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呈现出体育学科知识结构、体育学科组织、体育学科知识生产场域单一等问题突出。而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知识生产模式已焕然一新,螺旋式上升的知识生产活动代替了单一化线性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演绎着学科制度与学科文化的聚变和裂变效应,驱动交叉学科、跨学科的知识生产创新模式。体育学科在这一逻辑的影响下,需要从根本上探寻学科融合的内生机制,使学科融合真正成为体育学内生的自然过程<sup>[23]</sup>。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摆脱借用其他学科的基本范畴,或生搬硬套采用其他学科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最终导致体育学科成为其他学科的“跑马场”,实质上仍然是单一的体育学科自说自话的现实困境。因此,开展多学科的交流互动,需要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核心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组成的学术组织,如何在不同学科范式下,进行跨学科研究,并达成观念认同和价值共识。而跨学科组织归根结底很难形成统一共识,究其根本是学科文化与规则建制冲突。所以寻求体育学科交叉融合的统一倾向于以问题为导向,革新僵化固守的学科制度体系,打破孤立封闭的体育文化生态,构建共识的认知框架,构建不同学术组织彼此沟通的共同话语体系,这是体育学科交叉融合,进行深层次研究,破解多学科融合知识学科观点简单拼凑困境的关键途径。

## 4 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体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启示

在“集群式拓展型”知识生产模式的指引下,演绎与表征着体育学科的发展趋势,蕴藏与揭示着体育学科建设的实践启示,突出预示着体育学科建设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机制的科学性、有效性也直接制约着事物发展的方向,决定着事物运行的状态<sup>[26]</sup>。鉴于此,结合我国体育学科建设实践,从动力、组织、治理多维度,思考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下体育学科建设的长效机制,为体育学科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 4.1 重审体育学科知识价值观,建构“回应人民现实需求”的实践动力机制

体育学知识生产模式的不断演进,使体育学发展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将体育学服务于外在目标的功利性工具,转变为服务于人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内生性目标。正是这种适配国家战略要求、回

应人民健康需求的多元逻辑,引导着体育学科的持续发展。在体育学走进社会中心并与社会发生密切互动的同时,“以回应人民现实需求”的新语境,已经成为体育学科建设极其重要的内生动力。体育学所应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单一的学科知识已无法解决体育学所需研究的问题。体育学科建设还在一定程度上因袭着传统范式下多个单一目标的分割惯习,割裂体育学科的关联性整体,学科间缺少交汇,无法应对的体育问题逐步显现,如体育人才培养与市场实际需要脱节、儿童青少年体质下降、体育跨文化传播受阻等。

鉴于此,面向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要求,体育学科建设的动力机制,只有通过体育学科建设理念的深刻变革,寻求体育学科融合的内在机制,促进人的身心群多维度的有机整合,才能有效消除这一堵点问题。应从政策导向、平台建构、评价革新等方面,进一步引导体育学科建设从“学科导向”向“问题导向”转变,转变体育学范式碎片化、空心化的根本问题,以提高人民的生命质量与生活质量为内生发力点。围绕各子学科特有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展开研究,大力推进体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医学、理学与健康科学等各学科的交叉融合。围绕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影响体育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公关研究,为解决关键问题、引领发展道路以及关键技术研究,形成发展合力提供体育学科独有的支撑作用。

#### 4.2 催生体育学科协同创新的文化样态,建构具有聚合效应的学科组织机制

我国体育学科在推进高质量建设过程中,从学科组织结构关系的表面看是“多元一体”,然而实则却是“貌合神离”<sup>[27]</sup>。这是制约当下知识转型背景下体育学构建关联学科,汇聚研究视角,更新交流机制不可避免的“痛点”。因此,需要推动体育学科组织机制的构建,着力从加强体育学科组织的目标、制度与文化聚合3个方面推进。

首先,强化体育学科共同体的目标聚合,更新体育观念,达成价值共识。聚焦以身体活动为基本手段的主体目标,明晰体育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基本价值,推动体育学各类主体对本学科认同度的不断提升,培养体育学各类主体的学科自信与文化自信。这样多主体才能在体育学各领域中确定研究方向,保持研究领域价值导向的一致性,才能为体育学术共同体的搭建提供深厚的基础,规避学科功能分歧招致学科独立性认同分裂与社群割裂的隐忧。其次,增强体育学科建设的制度聚合。学科制度是承载知识生产创新的依托,促进基于体育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学科制度建设机制,扭转基于行政管理逻辑和绩效提升逻辑

的学科分化和重组的主导逻辑,促进学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多元制度的交互融通。最后,促进体育学科主体文化聚合。体育兼有生物意义的身体性与社会意义的人文性,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体育强国”战略征程中,充分发挥着体育学的学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功能,为如何服务于人自身发展,提高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有贡献<sup>[28]</sup>。因此,要进一步形成更加包容的体育学科创新文化生态,加强体育学科的学术文化、公众文化、企业文化交融互动,为体育学科组织的聚合效应提供文化引领。

#### 4.3 遵循学科发展与知识创生应然逻辑,建构分类共治的体育学科治理机制

在体育学科以中国特色体育实践为立足点,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首要目标下,体育学科治理应回应社会公众利益诉求,遵循社会需求逻辑<sup>[29]</sup>。将着力强化在治理体系、服务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等方面效用,凸显体育学科应用逻辑与知识逻辑双向互动的价值。学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总体上要以体育学科价值为引导,构建适应体育学科发展的文化生态与权力生态。既要重视体育学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还要注重体育学科的分类治理和特色发展<sup>[30]</sup>。

首先,优化体育学科治理结构,推动体育学科共同治理。传统知识生产方式的体育学科研究脱离了社会实际,共同治理要求协调和处理好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整合体育学科治理各主体、组织、制度与文化要素,重视具体情境问题和利益相关者权力诉求,提升体育学科发展实效性。其次,对标体育强国建设的战略任务,体育基础学科要为重点学科发展提供支撑,体育重点学科要助力体育强国战略的实践转化,新兴交叉体育学科要赋能体育重点学科的持续落实<sup>[31]</sup>,增进体育基础学科自身特质的学科命题与学科范畴,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打破学科“单向度”发展局面,加强学科整体性方向把握,促进体育学科与学校,体育基础学科与重点学科、新兴交叉学科等,以及体育学科与社会之间的统筹兼顾、协调共进,相互支撑,生态群落聚合,交叉汇聚与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体育课程介体”作用,建立体育学科知识与学生培养之间的双循环关系,形成“人-知”双向互动的人才培养目标,在人才培养中让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发挥作用。最后,遵循学科发展与知识创生应然逻辑,建构“以评促建”的体育学科评价体系,彰显体育学科特色、质量和贡献评价,强化体育人才培养质量和学生获得感。学科评价作为推动体育学科建设发展的制度设计,对推动学科提质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规制作用和引导功能。体育学科评价体系不仅

要顺应学术逻辑,还要回应社会关心的重要问题,及时回应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将体育学服务体育强国国家战略与人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作为重要评价内容,将知识创新与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契合程度作为重要评价方向,重点关注知识创新是否面向国家战略需要,将国家逻辑科学、合理地融入学科评价之中。注重知识的应用价值<sup>[11]</sup>,服务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实际问题,助力体育学科评价的科学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共生。

### 参考文献:

- [1] 王晓微. 成就·经验·反思·构建:中国体育学若干重要议题探骊——黄汉升教授学术访谈[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1, 44(12): 1-23.
- [2] 李冲,毛伟伟,孙晶. 新工业革命与工科课程改革——基于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新工科课程建设路径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 2022(7): 88-96.
- [3] 周爱光. 体育学从一级学科提升为学科门类的几点思考[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3): 1-8.
- [4] 张瑞林. 体育产业发展视域中的体育学科建设[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7): 1-7.
- [5] 唐小媚.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转型及其对学科建设的启示[J]. 高教探索, 2020(12): 29-33.
- [6] 王家宏,韩春利. 中国特色体育学科体系的构建与完善[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1, 45(8): 1-10.
- [7] 张震. 整体性与独特性:体育知识基本问题的具身哲学阐释[J]. 体育科学, 2021, 41(6): 68-77.
- [8] 张良. 论具身认知理论的课程与教学意蕴[J]. 全球教育展望, 2013, 42(4): 27-32+67.
- [9] 杨桦,任海.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构建[J]. 体育科学, 2022, 42(8): 3-20.
- [10] 邓星华,曾诚. 中国体育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境遇与实践路径[J]. 体育学刊, 2022, 29(4): 8-13.
- [11] 李政涛,周颖.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中国教育学的知识供给[J]. 教育研究, 2022, 43(2): 83-98.
- [12] 马焕灵. 论学科交叉的发展样态与行动策略[J]. 南京社会科学, 2022(9): 147-155.
- [13] 刘宝存,赵婷.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与研究型大学研究生生态变革[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21, 19(4): 102-115+187.
- [14] 陈亮,徐林. 跨学科组织融合:知识创造价值的理性诉求[J]. 现代大学教育, 2022, 38(4): 72-82+112.
- [15] 李博,王雷. 学科建构路径视域下体育学演进历程探微[J]. 体育科学, 2019, 39(12): 3-13.
- [16] 王琪. 西方体育科学起源与形成问题新探[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14, 31(1): 36-40.
- [17] 毛亚庆,王树涛. 论知识范式的转型与大学发展[J]. 教育研究, 2008(7): 49-53.
- [18] 程志理,焦素花. 运动行为研究的体育学学科独立性——基于体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考察[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1): 33-44.
- [19] 白强. 大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与学科建设创新[J]. 大学教育科学, 2020(3): 31-38.
- [20] 田贤鹏. 论学科内生发展逻辑:从知识生产演化到学科制度生成[J]. 研究生教育研究, 2020(3): 60-65+86.
- [21] 王润斌,黄汉升. 面向独立学科门类的体育学学理反思与探行方略[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9): 1-20.
- [22] 朱华伟. 知识生产模式转型背景下跨学科研究生培养探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2(5): 170-176.
- [23] 任海. 基于范式转型的体育学术共同体构建与体育学融合发展[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1): 1-7+19.
- [24] 黄瑶,马永红,王铭. 知识生产模式Ⅲ促进超学科快速发展的特征研究[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6, 37(6): 37-45.
- [25] 陈亮. 学科治理:内涵特征、权力属性与逻辑构架[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9(5): 101-110.
- [26] 白强. 知识生产模式变革下一流学科建设的逻辑转向与机制建构[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5): 14-22.
- [27] 马廷奇,郑政捷. 大学学科治理:逻辑意蕴、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21(10): 22-27.
- [28] 漆昌柱,郭正茂. “四新”建设背景下的新体育科建设理念与路径[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3): 257-263.
- [29] 张晓义. 体育学学科构建的逻辑起点:本体认知与现实需求[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9): 25-26.
- [30] 赵富学,杨桦. 新时代中国特色体育学话语体系构建[J]. 体育科学, 2022, 42(4): 3-13.
- [31] 王洪才,王兆璟,赵亮,等. 笔谈:新时代学科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审视[J]. 现代大学教育, 2022, 38(6): 39-59+112.